

环球人物
GLOBAL PEOPLE

10周年
典藏书系

季羡林：为学为人皆楷模

汪曾祺：西南联大的“坏学生”

杨绛：这个时代最惦记的隐士

黄永玉：“湘西鬼才”是个“老顽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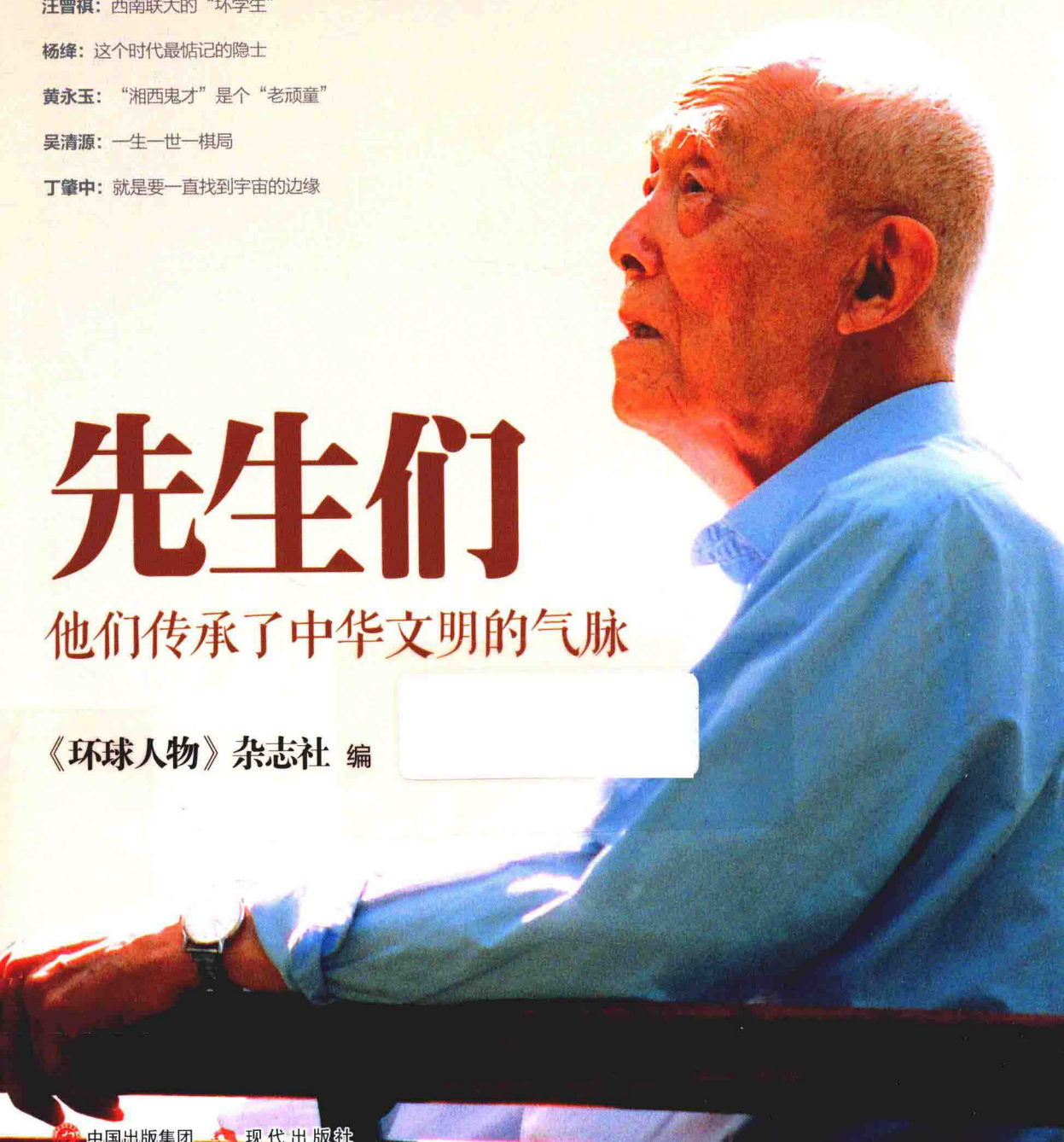
吴清源：一生一世一棋局

丁肇中：就是要一直找到宇宙的边缘

先生们

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环球人物》杂志社 编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环球人物
GLOBAL PEOPLE

10周年
典藏书系

先生们

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环球人物》杂志社 编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生们 /《环球人物》杂志社编.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6.3

(《环球人物》10 周年典藏书系)

ISBN 978-7-5143-4590-2

I. ①先… II. ①环… III. ①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① 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5375 号

先生们 (《环球人物》10 周年典藏书系)

编 者 《环球人物》杂志社

责任编辑 张 霆 姚冬霞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2.75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4590-2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录

- 季羨林：为学为人皆楷模 / 001
- 饶宗颐：一代通儒 / 008
- 任继愈：一生与名利无关 / 016
- 汤一介：儒者的光芒 / 022
- 杜维明：奥运让文明对话 / 028
- 汪曾祺：西南联大的“坏学生” / 034
- 杨绛：这个时代最惦记的隐士 / 040
- 马识途：一书写了 40 年 / 062
- 金庸：另一支笔写时评 / 067
- 叶嘉莹：一辈子和诗词谈恋爱 / 073
- 莫言：高粱红了 / 079
- 周有光：110 岁的热血青年 / 103
- 徐中玉：大学不能失语 / 114
- 杨宪益：翻译了整个中国 / 121
- 许渊冲：岁月困不住的人生 / 126
- 李文俊：“经典名著被遗忘了” / 133
- 任溶溶：改变了中国的儿童文学 / 138
- 夏志清：学界“顽童” / 145
- 柏杨：硬骨头文人 / 150

黄永玉：五重身份 / 154

李可染：画笔背后的辛酸 / 161

吴冠中：两个心愿都完成了 / 167

赵无极：作品一年卖出 2.4 亿 / 172

张仃：美术大师“背后的坚强梯队” / 177

吴清源：一生一世一棋局 / 185

陈祖德：一位真正的弈者 / 192

尔宝瑞：天天和伟人面对面 / 197

钱学森：感天动地 / 202

朱光亚：生活中做事严谨像做物理实验 / 213

李小文：但愿老死文论间，不愿鞠躬车马前 / 221

顾毓琇：曾和邓小平畅谈科教兴国 / 227

屠呦呦：非常诺奖之路 / 234

袁隆平：一粒种子造福世界 / 253

李振声：不愿做科学界的英雄 / 257

钱永健：爱玩危险游戏的诺奖获得者 / 263

高锟：诺贝尔奖是金婚礼物 / 268

丁肇中：就是要一直找到宇宙的边缘 / 271

欧阳自远：“嫦娥之父” / 280

闵恩泽：大科学家的小日子 / 286

华罗庚：一生悲欢离合 / 292

谷超豪：杨振宁称赞他站在高山之巅 / 300

师昌绪：“好管闲事”的科学家 / 305

郑哲敏：爆炸传奇 / 310

李爱珍：“科学不能今天栽树明天摘果” / 317

- 胡秀英：会走路的植物百科全书 / 322
- 茅以升：心中有另一座桥 / 328
- 王梦恕：大家都不说真话，社会就没希望了 / 335
- 梁从诫：梁启超之孙的“苦行僧”生活 / 342
- 吴良镛：诗意地居住为何这么难 / 348
- 陈志华：乡土建筑就是一部史书 / 355

季羨林：为学为人皆楷模

【人物简介】季羨林（1911—2009），字希逋，又字齐奘，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季羨林先生生前曾撰文请辞头上的三顶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如今，他依然戴着这三顶桂冠走了。从20世纪初的山东临清，到清华的“四剑客”时代，从德国的哥廷根，到北大的数十年，不管是为学，为师，为友，还是为人父子，季先生终其一生都保持着淳朴的本性，为后来的学人树立了典范。

先生的学问是寂寞的

暑假的北大校园，显得有些冷清。季先生的灵堂设在百年讲堂。

姜景奎教授是北大印度研究中心副主任，也是季先生的学生，他则自谦为徒孙。笔者找到他时，他正在为季先生的追悼会做准备。他表示，自己只愿意给先生守守灵，干些实实在在的小事。



季先生首先是一位古文字学家。

“全中国的人都知道季羨林，说他是国学大师，可是他在国学上到底做了什么工作，却没多少人知道。这是件极其悲哀的事情。”姜教授正在为季先生撰写生平事迹，作为同是研究印度文化的学者，他很详细地介绍了季先生毕生的学术成就，而这些一直被我们忽略和漠视。“季先生的学术成果比较全的是在《季羨林文集》24卷本中，从来没有哪个媒体提过他24卷本的东西。”

季先生首先是一位古文字学家。他通晓十多种文字，大部分都是古代语言，而且是已经死亡、只以古文献的形式存在的语言，如梵语、巴利语、吐火罗语、半摩揭陀语等。季先生这方面的造诣之高在国际上是无与伦比的。

在印度学方面，季先生是奠基者又是建设者。他在研究印度语言的同时，还透过语言研究文学、宗教和历史的问题。他翻译了《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印度最著名的两大史诗。

在中国，目前西方中心论仍很得势。作为一个东方学家，季先生却一直在倡导东方文学跟东方文化的研究。在季先生眼里，东方的文学、文化和文明绝不次于西方，甚至高于西方。

季先生又是一位佛教学家。他从语言的变化来研究佛教史，这些是从佛教到佛教，从古汉语到英语研究不出来的。季先生还是东西交流史的专家。以前我们认为，中印文化的影响是单向的，只是印度文化影响中国文化，最明显的就是佛教。而季先生研究中印两国交往的《糖史》《丝绸史》，打破了定式，他认为中印文化的交流是相互的，绝不是单向的。在《糖史》中，他考证出红糖的制造是印度的发明，中国把它引进过来，并在红糖的基础上制出了白糖，又传回印度。

此外，他是翻译家，他是作家，也是思想家。

姜景奎历数了季先生的学术成就，却并不赞成称季先生为“国学大师”。他说：“他只是老老实实在地做学问，他应该被称道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学识和治学的态度。可是被提得最少的，却恰恰是这部分。”

“这个时代，只能产生专家，不能产生大家了。”姜景奎说，“不过，大厦倾倒，地基永固。有了季先生给我们打下的地基，我们可以继续盖楼。”

季羨林曾居住的朗润园正是莲叶田田的时候。十五年前，季羨林把几枚洪湖的莲子敲开，投入楼前的湖水中，三年后，它们开花，便有了著名的《清塘荷韵》。又十二年后，荷花依旧寂寞地对影而落，如同一切喧嚣背后的冷清。“季先生的学问是寂寞的。”姜景奎说。

生活中像慈父，治学时是严师

姜景奎记得他入学时候看到的季羨林——一位普通的北大老师，总是拎着个包，穿着风衣去上课。课后，他也只是执着地坐着冷板凳，研究他的学问。尽管后来季羨林名气日增，但他对待学生，生活中像慈父，治学时是严师，从无改变。

季羨林去世后，许多赶来吊唁的弟子回忆起与恩师相处的点点滴滴，每每哽咽难言。北大教授张保胜师从季羨林时，季羨林的叔母还在世，季羨林就常常邀请学生到家里吃叔母做的拿手菜“山东醋卤酱菜”。张保胜对当年的美味记忆犹新：“炖了以后，他拿两大饭盒给我扣在一起，叫我带回家吃，每年如此，有什么好吃的他给你留着。”

张保胜说，季老生活中对学生关爱有加，但是如果学生交了一篇让他不满意的文章，那他就会毫不客气地退回去：“他平时非常客气，到这时候就直接说，你重做，不用改了。”

季羨林的另一位学生葛维钧回忆，季羨林在讲台上和讲台下，是两个不同的状态：“他在讲台上很严肃，穿着蓝布中山装就在那儿讲。而在生活中，他对待年轻人非常宽宏仁慈。每次去看他，离开时，他都要送到门口，

看你骑上车走。一直到2007年年初，我带一位30多岁的女编辑去医院看他，刚落座，季先生就对这位女士表示歉意，说他站不起来……”

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与季羨林交往不多，但他仍深深感佩季先生的人格魅力。他尤其提到了季先生对年轻知识分子的呵护。季羨林的弟子钱文忠说：“季先生无论自己多忙，总是乐于为年轻学者的著作写序。季先生还往往会在为某个人写的序言里面列举上一大串年轻人的名字，唯恐人不知道。至于替年轻人看稿子，推荐发表，那简直是家常便饭了。”反过来，季羨林很少要求年轻人为他做什么。“哪怕他偶尔找学生帮忙查查资料，最后也要在文章里、书里写上一笔。”

生活简朴，为人慷慨

2008年年底，季承终于有机会去探望长年住院的父亲。他通常下午4点去医院，给父亲带去家乡的小吃和妻子做的饭菜，陪父亲聊天，6点多离开，周末待的时间要长些。谈及寻常却久违的天伦之情，季承脸上溢出温暖的笑容。

季承说，在父子相聚的数月时光里，季羨林非常开心，每次见面，他总是笑呵呵的。他们一起聊天、读报、写毛笔字，相处得很融洽，最后那些天，季老的胃口很好，从中式的饺子到西式的罗宋汤，他都很爱吃。季承就变着法子给父亲做好吃的，其他来探望季老的朋友也投其所好，给他带来不同的美食。季羨林多次向周围的人说，这半年过得很愉快。

2009年7月10日，季承照常去探望父亲，发现父亲状况不错，还坐在床上写毛笔字，给两家单位题了词。季承为父亲按摩手臂时，老人精神依然很好，谈笑风生。可第二天一早，季承突然接到医院打来电话。他回忆说：“父亲突发心脏病，8点我赶到了医院，当时他已经昏迷，没有抢救过来。”

季承觉得，生活中除了学问之外，还能让父亲提起精神的就是猫。季羨林爱猫的故事可谓尽人皆知。读书之余，季羨林跟爱猫亲密无间，小猫跟着季羨林散步，成为燕园一景。

“夜阑人静，虚室凄清。万籁俱寂，独有孤灯。往事如潮，汹涌绕缭。伴我寥寥，唯有一猫。”从1989年到1995年，季羨林的叔母、妻子和女儿相继离世，心境低落时，季羨林写下了上面的句子。在他精神最苦闷的时候，猫给了他极大的安慰。

季羨林生活简朴，在北大是人所共知的。但是，知道他慷慨的人却并不多。季羨林常往家乡的小学寄钱寄书，连在他家里工作过的保姆，倘若喜欢读书，他都会给予资助。

前几年，北大接受了一笔最大的捐赠，就来自季羨林先生，仅仅古字画就有四百多幅。季羨林这辈子省下的钱，几乎都用于此。

如今，大家爱戴的季羨林先生走了，他的为人风范和人格魅力将长存于每一个认识他的人心中，也必定会在将来感召无数人。（撰文：朱珠 路琰）

〔附录〕季羨林：中国文化复兴的引领者

2009年7月11日上午，我正在长沙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会场，得知季羨林先生去世，心情很沉重。20世纪的人物已日渐凋零，那些峥嵘岁月也已成为历史。

季先生的离去其实是完整的生命过程的自然终结。我们常常希望个体生命可以无限延续，而生命却正是由于它的有限才弥足珍贵，才让我们领悟到个体生命的独特性。对于我们，季先生的故去当然是遗憾，但对于季先生的生命而言，是没有遗憾的，他已经完美地实现了自己，也最好地展现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平静地接受这位我们尊敬的老人的离去，可能正是我们所应有的态度，也是这位早已参透生死的老人的期望。

我们怀念季先生，首先是为了我们自己。我在十多年前应当时季先生的秘书李新先生之邀，为他们编辑的一本有关季先生的书写过一篇文章，讲了我和季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交往，我们的来往似乎也止于那篇文章的记述，后来季先生声望日隆，我就没有再去打扰请益。我和季先生

的专业并无交集，我只想从今天的角度再思季先生的意义。

我以为，季先生的意义首先在于他是一个现代的专业学者和一个中国传统的儒者的完美结合。

季先生当然是深入所谓“二西之学”（佛教和印度之“西”学和西方之“西”学）的，这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两个外来文化。他以西方现代的方法论深入印度和佛教思想的深处，他对梵文和巴利文等文字的把握，对于中印交流等方面的研究，都是专业方面一流的成果。所谓“隔行如隔山”，现代的学术已经有严密分工，高度专业化，季先生可说践行了现代学术的分工。

季先生又是一个传统儒者的典范。他具有一种传统的人文情怀。他的处世方式是谦和而明澈的，他的气质和风度是温和而自然的。他的平和与谦逊中有儒者的清朗和自然，也有佛家的恬淡和平静。我向季先生请益时，常感到他有张载《西铭》里所说的“民胞物与”的情怀和“知化穷神”的境界，这也被认为是儒者的最高境界。季先生未必是“国学”某个专业领域的专家，称他为“国学大师”当然有点不可思议。但他却以生命延续了中国传统的一脉精华。

季先生对于我们今天的意义还在于，他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执着地提出有关中国文化复兴的论述。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中华文化发展的未来还不清晰。季先生本人，在专业领域已有极高声誉，也以其散文闻名于世，而他却跨出他的专业领域，以一个洞悉世界文化的哲人的角度来思考他所安身立命的中华文化的命运。他坚信在西方文化主导世界几个世纪之后，中华和东方文化必将有一个伟大的复兴。他以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守护者的身份，为当时的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也为未来的中华文化的展开提出了方向和思路。

季先生提出他有名的关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时，西方文化对年轻人影响巨大，很多人都觉得老先生的见解是一厢情愿。在今天来看，这见解却有着惊人的预言性：中国历史性的崛起正在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国的精神和思想的发扬光大也可看到现

实的前景了。老先生参透了人类文明的命运，对文明的起伏消长的理解异常深刻。他的信念对于未来的我们如何延续和发展中华文化具有巨大的启迪。季先生在这一方面的意义完全超出了他自己的时代。

过去看苏辙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记述苏轼将逝时的情况，时常钦佩苏轼对于生死的通达：“未终旬日，独以诸子伺侧，曰：‘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问以后事，不答，湛然而逝。”（怛化，惊吓将逝之人的意思。）季先生其实也早就参透生死了，这里的“湛然而逝”用来形容季先生的逝去是最为恰当的。季先生的逝去是平静的，也是庄严的。

先生的精神不死。（撰文：张颐武）

饶宗颐：一代通儒

【人物简介】饶宗颐（1917— ），字固庵，号选堂，广东潮州人。国学大师。1949年移居香港，任教香港大学，又在新加坡大学、美国耶鲁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任职教授。1962年获法国汉学儒莲奖，1982年获香港大学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后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荣誉讲座教授。1993年为上海复旦大学顾问教授。2011年被推选为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2013年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凡甲骨、敦煌、古文字、上古史、近东古史、艺术史、音乐、词学等，均有专著，出版书40种，学术论文过三百篇。艺术方面于绘画、书法造诣尤深。

我国学术界曾先后将饶宗颐与钱锺书、季羨林并列，称之为“北钱南饶”和“北季南饶”。在钱锺书心中，饶宗颐是“旷世奇才”，季羨林则直呼“我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对这一切，清瘦的饶宗颐总是拱手致谢，蔼然郑重。

“饶公经常跟我说，人一生有际遇的问题，与很多同辈学者相比，自己的运气很好。”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副馆长郑炜明告诉笔者。诚然，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一些坐标意义重大——潮州的根基，香港的机缘，海外的荣誉，大陆的盛名，但贯穿始终的，是百年来这位学者孜孜不倦的钻研定力。

潮州，家学“熏蒸”

中学都未毕业的饶宗颐，后来却当上大学教授，成为学术界一段美谈。他说自己“得益于从小文化空气的‘熏蒸’”，学问是“熏”出来的。

1917年8月9日，饶宗颐出生在广东省一个与世无争的县城——潮安（今潮州市湘桥区）。当时，正值孙中山发起护法战争，全国动荡不安，潮州却因为地处偏远，文化仍然得以高度发展。

潮州素有“海滨邹鲁”之称。唐代韩愈曾在此为官，推广中原文化，此后潮州逐渐形成了崇文尚学的风气。除了文化领域，潮汕商帮是中国最具实力的商帮之一，以善于开拓的精神著称，李嘉诚是其中代表人物。

生活在潮州，饶家兼得文化和商业之所长。饶宗颐祖父曾任潮州商会的会长，于1902年创办了潮州第一所慈善机构“集安善堂”。父亲饶锸经营银庄，曾被称为潮州首富，又是当地著名学者，曾担任《粤南报》主笔。

饶锸致力于考据学，酷爱藏书，家中的天啸楼藏书达10万卷，曾经在广东东部一带最负盛名。他为儿子取名“宗颐”，是希望儿子能成为像北宋理学派开山鼻祖周敦颐那样的大学者。饶宗颐三四岁时，父亲便教他读杜甫的《春夜喜雨》和周敦颐的《爱莲说》。6岁时，饶宗颐开始阅读古典小说，最喜欢的是《封神演义》。10岁时，他已经阅读了《通鉴纲目》《纪事本末》《通鉴辑览》等古籍，全身心投入到天啸楼的经史子集之中，并跟随父亲聘请的名师学习，打下了绘画、书法和古文的深厚根基。饶宗颐后来回忆：“家学是学问的方便法门。要做学问，‘开窍’十分重要，既要



2012年6月28日，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饶宗颐在杭州出席媒体见面会。

让小孩充满幻想，营造自己的世界，又要让长辈引导入门，可以少走弯路。”

到了十几岁，当其他兄弟还在饶家的大宅里四处玩耍时，饶宗颐则在一处门廊上用楷书写下一副对联：“山不在高，洞宜深，石宜怪；园须脱俗，树欲古，竹欲舒。”通过这副对联，人们可以看到饶宗颐早年的书法功底，也可以窥见他日后为人熟知的那份淡泊名利的豁达。其实，少年饶宗颐就经常打坐吐纳，甚至以减食“辟谷”来印证道教的道理。这个习惯后来伴随了他的一生。

很快，饶家神童的名声就传了出去。饶宗颐的老友、香港潮州商会创会会长陈伟南向笔者回忆：当时饶氏父子在潮州声名赫赫，饶宗颐传说是一目五行的神童。老诗人王诚生前曾多次讲到饶公童年时的一则轶事。当时有文坛名士以潮州特产“姑苏香腐”出谜，猜唐诗一句，6岁的饶宗颐不假思索，即答以“吴宫花草埋幽径”（吴宫指在姑苏的宫殿），一时语惊四座。“当时饶公才6岁，就有这样的才学。”陈伟南说。

1930年秋，14岁的饶宗颐以优异成绩考入潮州金山中学学堂。当时在潮州能考上金中的，都相当于“举人”，享受礼遇。但饶宗颐觉得“在学校获益不大”，课堂上讲授的《史记》等经典，他早已读过。于是，入学后没多久，饶宗颐就回家自修，开明的父亲并未反对。

16岁那年，饶父突然撒手人寰，而母亲在他两岁时就已过世。身为长子，饶宗颐放弃入大学的计划，处理家中事务。“那时候，（父亲）留下庞大的财产与大批书籍，在这两者之中我选择了书籍。”他继承父亲遗志，完成《潮州艺文志》，踏出了学术生涯的第一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饶宗颐当时在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任艺文纂修，同时加入历史学家顾颉刚主持的禹贡学会，在学术界崭露头角。这一时期，受文学家詹安泰的委托，饶宗颐开始在潮州韩山师范代课，讲授训诂学、诸子百家。当时在韩山就读的陈伟南记得，一开始学生们对这位年仅20岁的老师十分怀疑，“结果教了一天之后，詹安泰问学生，他行不行？明天还让不让他来？学生说，来啊来啊，他教得好！”这是饶宗颐第一次走上大学讲台，从此开启了他长达40年的教学生涯。

香港，天时地利

饶宗颐后来移居香港，是缘分，也是命运安排。

1939年，潮州沦陷。饶宗颐带着满腔屈辱，前往已迁往云南的中山大学担任研究员。结果赴聘途中，他染病滞留香港。饶宗颐后来将这归结于“机缘”：“当时只是路过，不料身染疾病。我一辈子很少生病，偏偏那次生病留了下来，成就了今天的我。不然也许我到了中大，到现在还是一个讲授诗词的教授。”

“香港这个地方，在地图上看只是一个点，但它和中国学术的关系实在是大。我经常说，没有香港，就没有现在的饶宗颐。”饶宗颐告诉笔者。到香港之后，他结识了两位伯乐：一位是主持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还有一位是北洋名士叶恭绰。前者让饶宗颐帮他编写词条，协助编撰《中山大词典》；后者请饶宗颐辅助其编订《全清词钞》。在这种情况下，饶宗颐在香港读了很多书，接触到很多善本、孤本，为以后的治学打下了基础。“此外，叶恭绰是第一个提倡敦煌学的人，这一点也影响到我。”饶宗颐说。

香港沦陷后，饶宗颐曾返回广东，辗转逃避战火。父母早逝，战乱动荡，让他较早地体会到何为四大皆空，也逐渐参透何为心无挂碍。“饶公一生推崇苏东坡，因为面对逆境，他往往比较达观、超然，心态平和，乐观向上。”陈伟南说。1949年，饶宗颐再度移居香港。3年后，并无大学学历的他受聘成为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

在港大执教，饶宗颐主讲目录学、文字学、《楚辞》和汉魏六朝文学。他的潮州话、普通话与粤语都能讲得流畅标准，受到学生们的欢迎。饶宗颐的学生，港大冯平山博物馆原馆长刘唯迈告诉笔者：“他教书一定会备课，每次上课都带一个公事包，讲课十分有条理。”港大授课之余，饶宗颐还前往钱穆先生所办的新亚书院讲授“老子”等课程，同时继续研究敦煌学。

这一阶段，饶宗颐有同事热心政治，出任了国民党政会参议员。但饶宗颐不喜欢政治，专心治学。他在研读《昭明文选》时将著述又涉政的人